

「彈劾動議」背後的三步棋

□南禮



由社民連梁國雄牽頭、針對梁振英的「彈劾動議」，昨日已獲得民主黨及公民黨的支持。換言之，這已能滿足《基本法》所要求的四分之一議員的門檻，隨時可啟動彈劾程序。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反對派明知彈劾不可能成功，卻仍然堅持要在趕在年底提出？向來以穩重著稱的民主黨，為何又突然改變主意？事實是，反對派啟動彈劾，背後其實有三大棋要走：第一，以彈劾削弱梁振英管治；第二，將「B計劃」變為可能；第三，逼使中央全面接受一六／一七年雙普選。

羞辱特首 打擊管治

立法會昨日討論由民主黨胡志偉提出的對梁振英的「不信任動議」，一如意料，議案最終在分組點票環節中被否決。然而，與早前內部意見分歧不同的是，從議員發言中可見，反對派似乎已達成「逼梁振英下台」的共識。民主黨單仲偕在發言時就首次表明，

將原則上支持由梁國雄提出的「彈劾動議」；而據透露，公民黨也已表示會支持。算上公、民兩黨的十二票，加上梁國雄早握的八票，這已過了啟動彈劾的最低要求。

觀此態勢，特區成立十五年來，《基本法》頒布二十二年來，這條被視作立法會「尚方寶劍」的「彈劾動議」勢將首次在立法會提出，梁振英也將成為首位被「彈劾」的行政長官。而不論對於梁振英本人還是特區政府來說，這都不是積極的訊號。當然一如許多評論員所指出的，儘管「彈劾」被啟動，但梁振英要因此「下台」的可能性幾為零。

按《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款的有關規定，要彈劾成功必須要走六個步驟。第一，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18人）聯合動議，提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第二，經立法會分組點票通過；第三，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第四，報告有足夠證據證明行政長官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第五，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彈劾；第六，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顯而易見，儘管反對派湧向四分之一的票數啟動程序，但僅以梁振英擔任「失實陳述」為由，要想越過其後的五道關卡，定性梁振英「嚴重違法」、「瀆職」不存在成功的可能。然而，反對派並不會僅僅滿足

於「逞一時之快」、「過一過癮」；或者說，他們不只是想藉以羞辱梁振英而已。

以此次轉軀的民主黨與公民黨為例，早前一直對彈劾持非常負面的態度，理由也正是「提出也不可能通過」。有公民黨成員甚至公開說，彈劾動議應該是在有把握情況下再提，動不動提出，只會造成反對派「不負責任」的公案形象。僅僅過了兩星期，兩黨態度大變，有消息稱，從李柱銘涉入事件來看，反對派背後定來自於海外的「高人」指點。

外國勢力 背後操控

表面上看，「彈劾動議」不可能通過，不會影響香港政治大局。但一如前文所指出的，這是首次「成功」啟動程序，而梁振英又是首位被彈劾的特首，其政治意義非比尋常，甚至說可以載入香港政治史冊。梁振英甚至會因此被長期「標籤化」。更為重要的是，整個彈劾動議耗時甚久，從提出到正式辯論，最少掙扎數周時間，反對派將充分利用這一機會，加強對「僭建」事件的操作，抹黑、醜化、污辱梁振英，進而影響這位新任特首的國際形象、民衆觀感、管治威信。此舉更能夠一月一日元旦「倒梁」大遊行充分造勢。

羞辱梁振英僅僅是開始，只要在僭建一事上梁振英不能再拿出更多證明自己清白的證據，那麼必將長期影響特區政府管治。除了元旦的「倒梁」遊行，二零一三年的「五一」、「六四」、「七一」、「十一」幾乎都可能成為不同形式的「倒梁」示威，當中以「七一」尤甚。眼下香港經濟狀況尚佳，市民失業率也處於低水平，但難保經濟不會急轉直下、失業率不會上升，如果眾多因素碰在一起的話，這些遊行對梁振英與特區政府將是一個又一個的噩夢。反對派希望以這種「造勢」一方面向梁振英施壓，另一方面在市民中營造一種「B計劃」（撤換特首）有可能成真的情緒。

製造民意 要挾中央

即便梁振英不會因此下台，對反對派來說仍然牢牢把握主動。最為關鍵一點是，二零一六立法會選舉、二零一七行政長官選舉的產生辦法，即將在未來兩年內啟動討論，反對派通過梁振英的負面例子，挾着造出來的民意向中央施壓，逼使讓步在該年落實「雙普選」。

顯而易見，「彈劾動議」儘管不可能獲得通過，但提與不提，卻會對香港政治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反對派試圖以此為「突破口」，一步步「拉倒」梁振英，並在香港混亂的政局中謀利。因此，不論是從香港繁榮穩定，還是從市民根本福祉角度來說，都應全力抵制「倒梁」之舉。還要看清的是，背後到底是誰在操控香港的反對派政黨。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磨刀霍霍

黃牛

中國改革大戲帷幕拉開

□陳群

習近平廣東之行，被稱作「新南巡」的「破題之旅」，不僅在中國互聯網上挺讚如潮，也成為外媒眼中「中國可能發生變革」的「蛛絲馬跡」。這對中國國策意味着什麼？對中國未來預示着什麼？它意味着中國一台新的改革大戲正拉開帷幕。正如有外媒指出「中國下一個改革舉措的腳本正在創作」。



馬跡」。這對中國國策意味着什麼？對中國未來預示着什麼？筆者以為，新常委率先垂範新風，絕不僅僅是個「作風」問題，它意味着中國一台新的改革大戲正拉開帷幕。正如有外媒指出「中國下一個改革舉措的腳本正在創作」。

「八無」巡視垂範新風

習近平首次地方視察選擇深圳及廣東諸地，使「新南巡」的說法不脛而走。習近平走進群衆直接對話，他強調：「改革開放的決定是正確的……富國之路、富民之路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開拓。」習近平到羅湖漁民村探訪居民時，勉勵村民「要繼續走鄧小平的道路，並加以創新和發展。」習近平強調「鄧小平道路」，而且要求「要有新開拓」，無疑為中國今後的改革定下基調。筆者以為，今年是鄧小平「92南巡」20周

年，中共高層重走南巡路意在展現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中國要取得改革開放新進展，建成小康社會，沒有億萬民衆的誠心支持與奮鬥是不行的；面對「河中央，水很深，水很急」的艱難局面，不徹底掃除「空談誤國」、「官僚主義」、「貪污腐敗」、「脫離群衆」等執政弊端更是不行的。習近平此次「新南巡」，堪稱「八無」巡視：無歡迎橫幅，無列隊迎送，無紅色地毯，無封路擾民，無豪華酒宴，無清理現場，無一級保衛，無遮擋車窗。

似乎是南北呼應，在習近平「新南巡」之際，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在北京市西城區主持「學習十八大精神」座談會，聽取20位參會者意見。對此次會風之新，筆者對兩個例子印象極深：

一是「不可過度解讀」。中央宣講團成員蔣建國提出「對十八大精神不要過度解讀」。劉雲山問「什麼叫過度解讀？」蔣建國解釋，「本來十八大報告寫得很直白，很簡明，翻譯成外語都不需要做過多解釋，但是有些解讀文章不斷拔高，反而讓人不好理解了。」劉雲山聽後表示，「學習十八大精神，提倡原原本本閱讀原文」，「經過二傳手、三傳手，可能出現『歪嘴和尚念錯經』」，「要抵制浮躁之風、急功近利之風」。

二是「空話連野豬都騙不了」。劉雲山說，「如果用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假大空、黨八股去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也可能搞一陣風，也可能轟轟烈烈，但最後要落空。」他還講最近看了一本書，是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環文集，其中一個故事把他「逗笑了」：上世紀90年代初，湖北神農架野豬橫行，趕也趕不走。有人把獅子、老虎的聲音錄下來，用大喇叭放出

來。一開始野豬嚇跑了，但過段時間又回來了，因為它們發現只有聲音沒有危險，後來野豬把大喇叭桿子都拱倒了。村民們感慨「唱高調、說空話連野豬都騙不了」。劉雲山說，這個故事談的就是「空談誤國」。

「說空話野豬都騙不了」

2004年5月，習近平在浙江省一次黨內會議上語重心長地說「要拎着烏紗帽幹事，不要捂着烏紗帽做官。」這是他為官執政的一貫理念。據《閩東報》報道，1989年，習近平主政寧德9個月查處441名官員，選涉及2000多名官員。有人擔心會得罪當地幹部，習近平卻說：「這裡有一個誰得罪誰的問題，為己之私破壞了黨的權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黨，得罪了人民，而不是代表黨和人民利益查處你的幹部得罪了你。」他曾對一位紀委副書記說，「是300萬人該得罪，還是這兩三千人該得罪？那當然寧肯得罪這兩三千人。」

筆者以為，「拎着烏紗帽幹事」應成為所有中共官員的執政理念。近日在蛇口港樹起一個「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標誌性牌子，自然使人們與30年前「時間就是金錢」作一微妙對比。「金錢」與「興邦」的涵義是不同的，前者折射的是窮怕了的中國人「急切致富心理」，後者體現的是崛起的中國「民族復興偉大理想」。從「七常委大倡反民主」到「18名高官因貪、淫、曝光」，從「改變會風文風」到「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新常委吹開一代新風。而這股新風，將成為保障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執政法寶。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南京大屠殺75周年祭

□鄭海麟



中外連線

今年是南京大屠殺七十五周年。史稱南京大屠殺，一般是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侵華日軍在攻陷南京城期間製造的一系列大屠殺事件。是人類史上最殘酷的屠殺之一。總計被屠殺的無辜市民與已經放下武器無戰鬥能力的中國官兵達三十萬人以上；實際被強姦受害的婦女，據說不下八萬人之多，很多在被強姦之後又被殺害；無數住宅、商店、機關、倉庫被搶劫、焚毀和破壞，全城約三分之一的建築物被毀；這是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所犯最兇殘的戰爭暴行之一，也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大污點。

「日本人是魔鬼的魔鬼」

在整個「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軍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像一群瘋狂的野獸，誠如一位墨西哥作家指出：「日本人是魔鬼的魔鬼」；甚至有外國人指責說：「他們的野蠻程度遠遠超過野獸」。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慘絕人寰的情況，其原因可以舉出很多，但據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權威學者洞富雄教授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隊教育」。特別是日本軍官鼓吹對中國及其民衆的根深柢固的蔑視，鼓吹無視對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敵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響。當時負責關東軍謀略工作的參謀田中隆吉中佐在公開會議中便說過：「坦率地講，對中國人的看法……我認為中國人是豬羶，對他們怎麼幹都行。」

另外，日本兵大前嘉就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說：「那時，中國人是蟻羶之輩。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殺死蟻羶之輩，還會受到什麼良心責備嗎？」

戰時的日本軍人可以說從少年時代起便接受了軍國主義的思想教育，入伍後又在日本軍隊的「軍人精神」（也即是武士道精神）薰陶下，於是產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狀態。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軍人，從進入小學學習教科書起，便開始接受軍國主義的思想教育，「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時代已逐漸形成。這些具有嚴重封建性和殘暴性的武士社會的思想和習慣，被作為「國民道德」強加在他們頭上，而且還得到了「神國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灌輸，於是，這些天真的孩子或者是樸素的農民出身的軍人，便成了法西斯軍隊的兇猛的戰士。這也就是日本軍隊在南京大屠殺中表現出異常殘暴的思想根據。誠如佔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指出：「日本人強加於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過，是日本五十年來宣揚『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

存在「神國思想」拒絕反省

這裡所說的「皇道」，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標榜的以「天皇萬世一系」為中心的神國思想；所謂「大和魂」，也即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作為神之國的神國思想，其由來已久，他們尊崇天皇即是崇拜現在世上的神。這也就是日本民族神道思想和天皇萬世一系觀念之來由。這種以「天皇萬世一系」為精神支柱的神國思想，也是使日本產生拒絕反省的意識根源。他們認為，只要這種「皇道」不墜，日本民族便有可能從戰敗的廢墟中崛起，重新恢復世界最優秀民族之地位。誠如日本文學家竹內實指出：「在實際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膽怯的日本有了勇氣和信念，有可能說服自己去進行侵略和殺戮，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見以天皇萬世一系為核心的神國思想對日本軍人的影響之深。

日本人為實踐「皇道」（或曰「大和精神」）的具體表現，便是「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最初來源於儒家思想中強調為人臣應盡忠，為人子應盡孝的觀念，但傳入日本後，日本人將儒家這種思想與神國思想相結合，於是產生了一種敬天敬神、忠君愛國不惜犧牲生命的武士道精神。神國思想與武士道精神相結合，便是「大和精神」，也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思想核心。

對此，我們絕不可以掉以輕心，應堅持強硬的立場，遏阻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和實行對外擴張。與此同時，還要從文化上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或曰思想根源——日本的神國思想和武士道精神作徹底的清算，以便真正開啓日本人的反省意識，徹底破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思想傳統，使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慘劇不會再在人類歷史上重演。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政府新策應以促和諧為重

□周八駿



知微篇

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待具有香港永久居留資格而尚未在香港連續居住滿7年的居民，亦即尚未成為「永久性居民」者——本文稱之為「準永久性居民」，在申請社會福利、公共房屋等方面所採取的政策，有別於對待永久性居民。即使2011財政年度罕有地一次性發放每人六千港元，永久性居民只要年滿18周歲便可取得。但是，「準永久性居民」必須符合另外條件才可獲得。現行對待「準永久性居民」的差別待遇都是前三屆特區政府推行的，而最近新一屆政府推出「買家印花稅」（簡稱BT）則是對待「準永久性居民」的新的差別待遇。不同的是，BSD所針對的是收入和財富水平比較高的「準永久性居民」，之前所有差別待遇所針對的是收入和財富水平較低或者屬於貧窮者的「準永久性居民」。

BSD造成新差別待遇

在廣義上，所有「準永久性居民」都是「新移民」。他們選擇以香港為家，打算在這塊土地上長期生活。其中，收入和財富水平較高者，屬於投資移民或外來人才，只要不是香港以外其他地方對他們的投資或職業更具吸引力，他們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指日可待。

收入和財富水平較低或者屬於貧窮者則不一樣，他們來到香港定居，不具備或基本不具備再向其他地方遷徙的能力，但是，他們在香港的就業和生活狀況屬於社會底層。作為香港社會的一個結構性問題，這一部份「準永久性居民」才被稱為「新移

民」，他們的問題才被稱為「新移民問題」。在新一屆政府推行BSD之前，這樣的理解儘管不夠嚴謹，卻可以成立。

BSD將收入和財富水平較高的「準永久性居民」受差別待遇問題提上了香港社會層面。這不是危言聳聽，最近，我就遇到若干屬於外來人才的朋友，正打算置業做定居安排，突遭BSD，失了預算不得不擱置計劃。儘管置業已被剔出投資移民類別，但是，在香港投資移民做定居打算畢竟必須置業，而支付昂貴的BSD無論如何不會是對定居香港的一種鼓勵。

為什麼不採取「限購」措施代替BSD遏抑香港地產市場投機呢？除非決策者堅決在「準永久性居民」與「永久性居民」之間劃一道分明的界限，否則，沒有理由打擊「準永久性居民」真心實意地為香港社會長期奮鬥。

封閉必將造成消沉

香港本地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為負數。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面積仍有餘地供更多居民生存。香港面對21世紀全球金融經濟政治格局全面調整，需要更多外來人口融入香港社會。香港一直以高度開放著稱於世，一旦香港社會滋長孤芳自賞心理，香港的核心價值注入封閉元素，那麼，香港社會生命力便無可挽回地消沉。

金融是當今世界最具開放性和流動性的經濟活動，伴隨着資金、信息開放和流動的是人才的流動和聚散。香港經濟惟有金融向全球性競爭力，致力於維護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應當是特區每一屆政府的施政優先項目。衷心希望本屆政府充分評估BSD對於吸收外來投資和人才、對於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負面影響。重要的是，採取其他措施能夠收BSD之正面效果而避免BSD的負面影響。

現行對待收入和財富水平較低或者屬於貧窮者的「準永久性居民」的差別待遇，固然是前幾屆特區政府遺留的政策，但是，本屆政府有責任加以審視以決定是否繼續實施。再詭的是，這部分「新移民」需要政府「扶貧」或提供幫助，卻被有關差別待遇拒之門外。

「和諧香港」更加緊要

我理解，有些差別待遇是特區第一二屆政府在財政遭遇嚴重赤字時作為「節源」措施而實施的，有迫不得已之況。然而，特區第二屆政府後期已扭轉財政赤字，第三屆政府進一步累積龐大財政儲備，第四屆政府從解決香港貧窮問題全局着眼，應當將這部分「新移民」的特別困難作為必須處理的問題，適時修訂在社會福利和公共房屋等事宜上的差別待遇。

必須承認，今日香港社會很不和諧，因此，努力建設和諧社會變得更加緊要。「和諧香港」需要所有香港居民共同締造，其中，「永久性居民」和「準永久性居民」都是主力軍。無論就締造「和諧香港」大目標還是盡可能發揮「準永久性居民」積極性而論，特區政府都必須盡可能並且盡早取消對於「準永久性居民」的差別待遇。

最近，香港本地若干民意調查或社會問題研究報告都披露，「新移民」即「準永久性居民」在香港社會受明顯歧視，香港社會對待他們的態度呈現嚴重分化。鑒於「準永久性居民」即「新移民」大多數來自內地，加之近一二年香港社會在反對派及其後台老闆精心策劃下，對於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體經濟瀰漫負面情緒，新一屆特區政府需要從解決香港社會貧富懸殊問題出發也需要從建設香港與國家主體關係出發，審視和修訂對於「準永久性居民」實施差別待遇的各項政策措施。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